

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

熊昌银

内容提要：16世纪以来，美洲等地生产的机制标准化银元大量流入中国。起初，使用银元不仅需秤量计算，与银锭、制钱汇兑时也常需贴水。然而，银元在与银锭、制钱的长期竞争中，优势日益明显，流通数量和空间均有大幅增长及扩张，进而成为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流域通商口岸的主币，市场偏好银元也使得上海、广州等地洋厘常年居高不下。光绪十六年（1890）以来各省根据鹰洋形制及成色仿铸的银元，逐渐成为市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清季民初的币制改革，均以银元为国币，并建立了元、角、分的货币体系，废两改元则实现了银元对银锭的货币取代。银元胜出的理论依据在于其形制统一、价值稳定，节省了一定的检验费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对传统秤量货币的优势。另一方面，清季民初各省和中央政府的推动也是银元胜出的重要原因。银元是从秤量货币到信用货币的重要过渡，以银元为准备金的纸币发行对1935年的法币改革也有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 银元 主币 货币体系

16世纪以来，从美洲、日本等地进入中国的外国银元种类繁多，主要有西班牙银元（Carolus Dollar）、墨西哥银元（Mexican Dollar）、美国贸易银元（America Dollar）、日本银元（Japanese Silver Yen）等。此外，还有西贡银元（Saigon Piastre）、秘鲁银元（Peruvian Dollar）、智利银元（Chilean Dollar）等较为少见的银元。其中，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先后在中国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成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主要货币。光绪十六年以后，广东、湖北等十余省份均依据外国银元形制铸造了大量的机制银元，而民初的袁世凯银元也流通渐广，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币。

关于银元在近代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彭信威认为清代的用银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从银锭到外国银元进入，再到中国实现自铸银元。^①王业键认为，银元的普及是18世纪以来的整体趋势，并总结了咸丰年间以后银元流通的3种趋向。^②百濂弘对清代西班牙银元在中国的流通线路、数量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等层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探讨。^③王志英（Richard Von Glahn）探讨了19世纪中国市场上外国银元的流通特点。^④何汉威考察了清季新式货币

【作者简介】熊昌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xckhistory@163.com。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流通研究（1843—1923）”（批准号：17CZS028）、2018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立项重点课题“明代以来广州对外贸易与白银流入”（批准号：2018GZZ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第一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上报告，得到点评专家李伯重教授及其他与会老师的指导，谨致谢忱！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页。

②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

③ 参见[日]百濂弘《清代西班牙银元的流通》，刘俊文主编，杜石然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9—486页。

④ Richard Von Glahn, “Foreign Silver Coins in the Market Cultur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 No. 1, 2007, pp. 51–78.

的发行及影响,并以清末民初港、粤银辅币的竞争为视角,分析了香港领土型币制的演进与形成。^①朱嘉明则认为,乾隆中期时,银元已经走出了“银两制度”的框架,形成了与“银两制度”平行的“银元体系”。^②岸本美绪结合刑科题本、契约文书等资料,对清中期东南诸省的货币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③而银元如何在与银锭、制钱的竞争中胜出,成为近代中国市场上的主币,至今鲜有学者涉及。因此,本文拟从银元在近代中国货币市场的份额、长时段的洋厘变化情形、银元相对银锭和制钱的优点以及政府推动等几个方面,探讨银元在与银锭、制钱竞争过程中取得优势并最终成为国币的原因。

本文所指的“良币”是相对于手工打造的银锭以及历朝形制均有差异的各式制钱而言的,是指由大机器生产的形制统一、价值稳定的银元,检验方便、信誉良好。而“主币”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的流通份额,根据彭信威、阿特韦尔、霍曼、萧亮林等人的统计,外国银元以及中国自铸银元占到近代中国货币总量的一半以上,据宣统二年(1910)度支部的调查,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总量大约有11亿元。而民国二年(1913)的调查显示,广东、湖北、江苏等省铸造的银元数量也达到20602万元以上;^④二是指银元流通对清季民初币制改革的直接影响。宣统二年颁布的《币制则例》以及民国三年颁布的《国币条例》均规定以银元为国币,并确立了“元、角、分”的货币体系,而1933年的“废两改元”则实现了银元对传统银锭的取代,银元成为本位货币。

一、外国银元流入与晚清自铸银元的开展

15世纪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国际贸易急剧增长,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人先后到达中国。最先与中国联系的是葡萄牙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啡璠·比利·特·安刺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率葡萄牙船和马来船各4艘出航,在上川岛下碇,被允许率船两艘前往广州。^⑤在葡萄牙人之后,万历三年(1575),来自马尼拉的两个西班牙使节来到广州,遂被送往水兴谒见总督,受到礼遇。^⑥自此,葡萄牙、西班牙商人拉开了西方与中国展开大规模贸易的序幕,两国除了将货物运往中国,也向中国输入西班牙银元,每年达200万元以上。^⑦荷兰人到达中国的时间稍晚于葡、西两国商人。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瓦尔维克(Wybrand van Warwick)率船到达广州。^⑧崇祯十年(1637),英国商人首次抵达广州进行贸易。其后不久,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取得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⑨17世纪中叶以来,荷兰、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逐步扩大,逐渐超过西班牙、葡萄牙。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商业的蓬勃发展,作为通货的白银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补充。法国人到达中国的时间在顺治十七年(1660)以后,其商馆于雍正六年(1728)设立,但整个18世纪,法国与中国的贸易仅限于很小的规模。^⑩美国人进入中国的时间更迟一些,乾隆四十九年(1784)方有第一艘商船来中国。在此之前,美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同中国进行茶叶贸易。但美国依靠向广东输送

① 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3分,1993年印行,第389—484页;《香港领土型币制的演进:以清末民初港、粤的银辅币角力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1分,2015年印行,第97—227页。

②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27页。

③ [日]岸本美绪:《清代中期中国的货币使用情况——以东南诸省为中心》,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95—216页。

④ 张辑颜:《中国金融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9—30页。

⑤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页。

⑥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51页。

⑦ 百濂弘:《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刘俊文主编,杜石然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第449页。

⑧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52页。

⑨ 李木妙:《明清之际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新亚学报》第18卷(1997年)。

⑩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64页。

阿拉斯加的毛皮和夏威夷的檀香来巩固对华贸易则在数年之后。^① 上述国家不仅将欧美的货物运入中国,也运来了大量的银条、银元,以换取中国的生丝、茶叶。五口通商以后,国际贸易规模空前扩大,巨额数量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市场。^②

较早流入中国的是西班牙银元,有“双柱”、“查理”、加罗拉四世和费迪南七世银元等多种形制,其中印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人像银元,被称为“佛头”,^③亦有“三工”(Three-Gong)、“四工”(Four-Gong)、“大衣”(Large Robe)之称。^④ 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称:“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又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连年居然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⑤此处所指花边,即为西班牙银元,最初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使用,成色达90.278%。^⑥ 西班牙银元作为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最广的外国银元,多在江苏、浙江、安徽、直隶等省使用。至咸丰六年(1856),凡沿长江各地以及上海,皆见其踪迹,交易多用此币。银行所开汇价,皆以此为依据。^⑦

不过早在道光年间,西班牙银元即已停止铸造,但其仍然深受市场欢迎。光绪十六年,西班牙银元在安徽、河南等地畅行,并未因停铸而消失。^⑧ 光绪三十年,在安徽滁州等地,市场上仍可见到西班牙银元,且有较高的升水。^⑨ 直至民国八年,西班牙银元仍与鹰洋、龙洋、袁世凯银元一同在浙江、安徽等地区流通。

取代西班牙银元成为流通中主币的是墨西哥银元,其又有鹰洋、英洋之称。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开始独立铸造银币。^⑩ 随着西班牙银元停铸及相互间竞争造成实力的此消彼长,鹰洋逐步北上,流通至福建、浙江、上海、江苏,乃至天津、东北和西南广西、云南等地,成为继西班牙银元之后行销最广的外国银元。据彭信威估算,自光绪三年至宣统二年墨西哥输出银元共四亿六千八百多万元,其中一大部分流入中国。^⑪

由于洋银的广泛流通,光绪年间,广东、湖北等省开始自铸银元,企图取代市场上的洋银。据统计,外国银元与中国自铸银元占到1840—1911年货币总量的一半以上,详见表1。

表1 1840至1911年中国货币形式和数量

货币形式	数量	以元计值	百分率(%)
中国银元	240 000 000 元	240 000 000	9.6
外国银元	1 080 000 000 元	1 080 000 000	43.4
铜元	200 000 000 000 枚	149 000 000	5.9
银两票	30 000 000 两	42 000 000	1.7
银元票	50 000 000 元	50 000 000	2
铜钱票	134 000 000 串	100 000 000	4

① 百濂弘:《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刘俊文主编,杜石然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第464页。

②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Aug. 4, 1917, p. 68.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79页。

④ Richard Von Glahn, "Foreign Silver Coins in the Market Cultur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 No. 1, 2007, pp. 54-56.

⑤ 《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请严禁洋商私运内地纹银及贩进洋钱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⑥ 百濂弘:《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刘俊文主编,杜石然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第449页。

⑦ [英]耿爱德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38页。

⑧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Feb. 14, 1890, p. 125.

⑨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Apr. 22, 1904, p. 76.

⑩ 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中译本),第150页。

⑪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79页。

续表 1

货币形式	数量	以元计值	百分率(%)
外国钞票	110 000 000 元	110 000 000	4.4
银锭	250 000 000 两	347 000 000	14
铜钱	500 000 000 000 枚	373 000 000	15
总数		2 491 000 000	100

资料来源:阿特韦尔:《白银札记》;霍曼:《统计说明》;萧亮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3—1937)》以及郝延平的估算数据,均转引自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从表1可以看出,19世纪40年代以来至清末,外国银元在所有货币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市场份额达到43.4%,其次是铜钱,占15%,银锭占14%。换言之,中国传统的银锭、铜钱之和尚不如外国银元所占份额。同时,深受外国银元形制、重量、成色影响的中国自铸银元也占总数的9.6%,两者之和达到53%。由此可见,晚清的货币市场上,银元已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①

晚清各省铸造的各式银元亦不在少数,光绪十六年,广东开始设局铸造银元,据《美国铸币厂报告》(U. S. Mint Report)记载,粤局在最初9年铸造的银元总数52 310 760.15元。^②其中,1898年所铸银元总数为7 977 926元。^③次年铸造的银元总数为7 854 960元。^④截止到1899年,广东造币厂所铸银元总数约56 768 742元,直隶所铸共5 860 905元,福建所铸共1 910 236元,江宁铸币值12 826 547元,湖北所铸23 353 124元,加上其他各省所铸银元,全国总数应在1.2亿元上下。^⑤眼见各省铸造银元卓有成效,清季度支部通电各省督抚收回生银、银锭,改用银元,并筹流通行用之法,^⑥同时在天津设立造币总厂,以期统一铸造银元。但未过多久,清廷覆亡。鼎革的民国政府继续铸造机制银元,正面镌刻袁世凯像。袁世凯铸造的银元,由于品质良好,无论在商埠、城镇还是农村市场,均流通甚广,行用无阻。^⑦而自民国三年规定国币以来,库平七钱二分,成色八九之银币已逐渐通行全国,而一切税收亦皆以银元为本位。^⑧此后,袁像银元逐渐成为市场上的主币。

二、市场偏好银元的表现

实际上,无论是前期盛行的西班牙银元,还是中后期流通甚广的墨西哥银元、美国贸易银元等,均具有较高的升水。西班牙银元在福建、广东、江西、江苏、浙江等省,价格均超过同等重量的银锭。鸦片战争后,英国站人洋、日本龙洋、法国贸易银元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亦都有价格升水。^⑨“1848年至1856年,西班牙银元每元兑换铜钱从1 150文上升至1 500文。”日益增加的银元,逐渐流入邻近的产丝区和绿茶产区。在同一时期,银元的镑价,即与英国汇率的变化,在4先令和5先令6便士之间波动。而太平军带来的灾难所造成的恐慌,银元被公认为具有一定价值的且最为方便的货币形式而加以收藏,且价格远超其实际价值,其对英汇率上升到5先令7便士至7先令9便士。换言之,其

① 张公权根据度支部在宣统二年的统计数据,认为晚清市场上的外国银元为11亿元。参见张公权《论英洋龙洋之消长及英洋之自然消灭》,《银行周报》第1卷第8期(1917年)。

② Wen-pin Wei, *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 48.

③ R. W. Mansfield to Sir Claude M. MacDonald, Canton, March 18, 1899, FO 228/1321, p. 125.

④ B. C. S. Scott to Sir Claude M. MacDonald, Canton, April 30, 1900, FO 228/1358, p. 99.

⑤ 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3分,第410—411页。

⑥ 《改易银锭为银元》,《大同报》(上海)第16期(1908年)。

⑦ 徐裕孙:《国币条例公布后之银元进化观》,《银行周报》第8卷第9期(1924年)。

⑧ 《海关税政征银元提案》,《全国财政会议日刊》第6期(1928年)。

⑨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04页。

平均价值提高了25%至30%。^①“自1854年初到1855年末,徘徊于6先令与6先令3便士之间,升水区间为44%—56%。”^②

墨西哥银元起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因商民对西班牙银元的偏好,常须贴水。但西班牙银元停铸后,来源渐绝,墨西哥银元成为无可选择的替代者,其在广州等地的价格很快就与西班牙银元相等。而墨银的升水在中国南部比在长江流域更高。这一差额促使怡和洋行的A. G. 达拉斯时常在上海购进这些硬币,然后运到广州和香港出售。^③在1856年的广州,墨西哥银元在与西班牙银元进行汇兑时,其价格已相差无几。^④香港殖民地总督赫卡利斯·鲁滨逊爵士在1863年通令墨银是香港唯一的法偿货币,并在中国广泛流通,不仅在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通行,在中国中部的产丝区,亦须使用未磨损的墨银,伴随很高的升水。^⑤至19世纪60年代,由于银元在贸易中及运入内地途中便于携带,因此其升水有时高出其实际价值的15%。上海商人原来偏好西班牙银元,后来转而爱好整洁的墨西哥银元了。^⑥清中后期进入中国的美国贸易银元,也有较高的升水。“它们以可观的升水,有时甚至高于墨西哥银元的升水通行。这种银元经过正式鉴定后,通常得到中国官方认可。广东、广西、福建和浙江当局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都曾出告示保护这种铸币,禁止贗造。”^⑦

而从地域来看,无论是东南沿海广东、福建两省,还是长江下游上海、江苏等地,洋银均存在一定的价格升水。18世纪,西班牙银元在广州已极为流行,在与银锭汇兑时,有较高的升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15年。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表明,纹银的价格非常低,可以按折扣银元7%或8%购得,由于纹银的纯度要比银元高8%,所以当人们在广州购进纹银装运到加尔各答出售时,纹银与银元的差额达到15%或16%,^⑧纹银比银元便宜。换言之,银元能交换到高于其实际价值的银两。而1845—1848年3年间银元的升水波动于4.5%到10%之间。^⑨

上海洋银的价格情形与广州存在一定的差异。19世纪40年代,上海的货币与度量衡十分混乱,银钱往来使用名为细丝纹银的银锭及西班牙银元。在上海流通的主要是老板洋(西班牙银元),相比别的银元有5%到10%的升水。光板鹰洋100元兑换光板老板洋95元、老板或新板毛洋93元。当时,纹银每两合铜钱1720文,老板洋每元合铜钱1280文。^⑩到1850年左右,一块西班牙银元(1元)要兑换1300—1400文铜钱。^⑪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丝、茶的贸易结算需要巨额的银元,尤其偏好西班牙银元。一般情况下,上海市场上的西班牙银元能兑换4先令6便士至4先令10便士,有8厘到1分6厘的升水,而在战乱银根吃紧之时,升水更高,^⑫远超其实际价值。

尽管上海在咸丰七年即已采用九八规元作为记账单位,但在实际交易中,须将银元折合成银两,

① The North-China Herald(1850—1867), Apr. 19, 1856, p. 150.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468—469页。

③ 达拉斯(上海)致戴维·贾丁(香港),1851年5月3日,怡和档案。转引自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第45页。

④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 6, 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 1854—66, Dubli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4—45.

⑤ 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第44页。

⑥ S. W.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Hong Kong: A. Shortrede, 1863, pp. 198—199.

⑦ Frank H. H.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79.

⑧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3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需要澄清的是,纹银的含银量在93.5%左右,而银元含银量多为90%,因此纹银的含银量比银元高3%,而不是8%。

⑨ “Returns of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 19th 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1849, Vol. XXXIX, p. 13. 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

⑩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Sep., 1846, p. 471.

⑪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 40, Statistical Returns, Accounts and Other Papers Respecting the Trad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02—88, p. 725.

⑫ 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第42页。

此之谓洋厘。洋厘行市成为上海市场的重要交易规则,无论中外商号,均须探知当日洋厘市价,以作为交易中银价计算的标准。^①通过对《北华捷报》记录数据的整理,可见1867—1872年间上海市场上的洋厘情形,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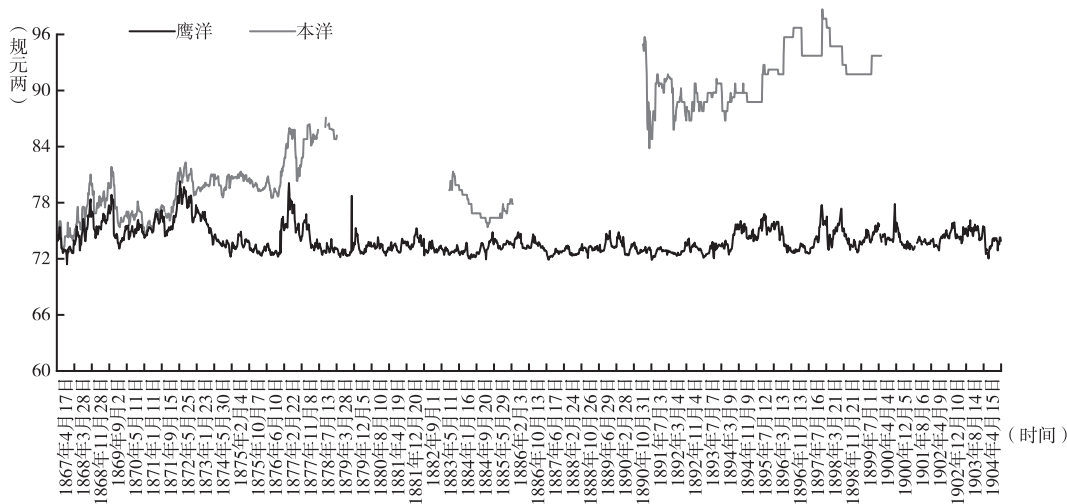


图1 100元本洋和鹰洋兑换规元数

资料来源: The North-China Herald, Commercial Postscript, Exchange, 1867 - 1904。

《北华捷报》和《申报》记录了1867—1912年间每周洋厘的比价,鹰洋行市的比价十分完整,本洋(西班牙银元)行市中间年份缺漏。从图1可以看出,本洋和鹰洋均有价格升水(按照清政府规定,100银元汇兑72两海关两),本洋的价格升水十分高昂,后期更是远超其实际价值,原因在于商民对本洋的偏好以及本洋停铸后引起价格暴涨。而鹰洋的升水也很明显,几乎均超过72海关两。

除了对外贸易最为集中的广州、上海两地,江苏等市场上的洋银亦有很高的升水。道光十三年(1833),据陶澍、林则徐奏称:“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漕平七钱三分。当价昂之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②然而仅仅过了4年时间,“近日苏松一带洋银,每元概换至漕纹八钱一二分以上,比较三四年前,每元价值实已抬高一钱,即兑换制钱亦比纹银多至一百文以外。”^③范锺也称:“海夷所来之番钱,昔有马剑、双烛、佛头诸名。四十年来,惟见佛头而已。……市平重七钱三分有奇,银色仅九五,忆幼时每一枚易钱六百余文,……近数年来,每一枚可易钱一千三百文。”^④而更上游的商埠芜湖格外偏好洋银。18世纪至19世纪初,芜湖地方存在着约计40万元没有加戳的本洋光板,它的交换价值要高出实际价值30%到40%,流通区域也从广州扩张至长江流域,可谓空前绝后的现象。^⑤

相比华南以及长江流域的商埠或通商口岸洋银具有较高的升水,华北天津和牛庄等通商口岸则是根据银元的含银量与纹银进行汇兑,大致为70两汇兑100元,接近等价交换。^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直隶等省开始铸造龙元,银元在华北的流通也日渐盛行。

三、银元胜出的原因

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东南沿海市场交易中的重要结算货币。尤其是大宗的丝、茶出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555页。

② 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22—1911)》第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726页。

③ [清]林则徐:《漕费禁给洋钱折》,《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4,1936年铅印本,复旦大学古籍部藏书,索取号549021(2)。

④ [清]范锺:《花笑庵杂笔》卷6《番钱》,复旦大学古籍部藏书,索取号662079。

⑤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朝制度考》),Shanghai: Kelly and Walsh,1921, pp. 164 - 165.

⑥ S. W.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p. 268.

口贸易以及鸦片进口贸易,多以银元来结算。而清季民初铸造的银元,不仅成为流通中的主币,也成为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国币。

(一) 丝、茶、鸦片等大宗贸易的结算货币

16世纪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而欧洲商人在广州的商业贸易,主要使用本洋和鹰洋结算。18世纪以来,外国商人使用外国银元赴浙江购买生丝,逐渐成为习惯,美商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行东何德二世(Augustine Heard, Jr.)指出,本洋不但享誉沪上,而且在内地的生丝产地,也炙手可热。^①可见不止洋商单方面使用洋银,华商以及产丝的农户均偏好洋银。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放通商时,其与宁波、苏州、杭州一样,早已通行西班牙银元了。大多数做小买卖的店铺都按银元交易。银钱业使用银元的进展比较迅速而且较有决心——市上流通的钞券大部分指明为银元。在广东、福建近海省区,凿过的和破烂的银元,与银锭一样通用;这种银元也通用于南部山脉两边的红茶主要产区,同时以河口为主要贸易中心。外商发现银元在此处通用,便以银元为记账单位。日益增加的大量银元,逐渐流入邻近的产丝区和绿茶产区。^②咸丰五年,生丝出口情形畅旺,从上海运出的数量和价值有显著增加,欧洲对华丝的需要相应上升。虽然茶叶出口减少,但生丝出口大幅增加,因此当年运入的白银,除了私人船只运载的大量白银未计在内以外,单是大英轮船公司的船只装运的白银,咸丰七年共达14 401 062墨西哥银元。^③咸丰七年,生丝交易引发了对现金的需求,使得1元西班牙银元值1两白银。此后,随着生丝交易的剧增,西班牙银元供给减少,银元的价格攀升,外国人逐渐用墨西哥银元来替代西班牙银元,用于生丝结算。^④民国初年铸造袁世凯银元后,江南无锡、绍兴等处,“丝茧用款原用英洋(鹰洋),近则改为新币,其他如天津、汉口等处,本为通用龙洋之地,故推行新币,尤为容易。自新币面世后,推测目下情形,大有取代英洋之势。……天津、南京两厂开铸之后,渐渐流通于上海。”^⑤

茶叶同样是出口大宗商品。咸丰元年,怡和洋行计划在中国内地大规模收购丝茶,而其他外国洋行和中国商人也有同样的计划。为避免竞争中落下风,颠地洋行和广隆洋行各自预付了30万元和80万元的茶款,怡和无奈之下也付给泰记15万元。怡和的达拉斯曾在信中提到:“泰记非常自信他能得到第一批茶叶,我鼓励他在内地以上述价格或接近此价格签订合同。基于此种想法,在已经预付或答应预付的10万元外,我正逐步给他更多的资金,到50万元为止。”^⑥

进口最大宗的是鸦片,最初从土耳其、波斯一带进口。19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占到进口总数的大多数。尽管早在1780年清政府就已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但仍有行商新官以每箱210元(西班牙银元)的低价,从东印度公司“诺萨奇”号商船上买下公班土1601箱。^⑦而咸丰六年的上海进口鸦片33570箱,白皮土每箱376元,公班土每箱310元,共值约1200万元。^⑧

大宗商品的交易,依赖于更为简便的结算货币,而银锭检验繁琐、铜钱形制过小,银元成为更理想的选择。

(二) 政府及银钱公会的推动

前文提到,外国银元自16世纪中后期流入福建、广东等沿海商埠,在农村也有广泛使用。康

① 琼记洋行档案, Augustine Heard, Jr. “Old China and New.” GQ-2, p. 33. 引自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于宗先等编:《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581页。

②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50-1867), Apr. 19, 1856, p. 150.

③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50-1867), Jan. 3, 1857, p. 90.

④ Six Essays on the Trade of Shanghai, reprinted from “The Celestial Empire”, Shanghai: Gazette Office, 1874, pp. 64-65.

⑤ 张公权:《论英洋龙洋之消长及英洋之自然消灭》,《银行周报》第1卷第6期(1917年)。

⑥ 达拉斯(上海)致戴维·贾丁(香港),1851年5月20日,怡和档案。转引自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第193—194页。

⑦ David Edward Ow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53-58;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3卷,第358页。

⑧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50-1867), Jan. 3, 1857, p. 90.

熙末年时因制钱缺乏,福建德化等县奏请以番银纳税,康熙末年庄享阳《禁洋私议》云:“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①到了乾隆年间,“福建省用外国银元而非银锭缴纳赋税。”^②福建德化县因纹银、制钱缺乏,请求以番银(西班牙银元)缴纳契税,“因德邑地处山僻,纹银艰觅,投税甚少。请将番银照收钱粮之例,每番银一员折纹银六钱二分,如有不足尾数,仍照时价交钱补凑,”^③得到了福建布政使的许可。道光九年,上谕:“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④

而在上海,本洋停铸后升水异常,外商要求上海道台推动鹰洋在市面流通。在英、美等国领事的强烈要求下,咸丰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道台发布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公告,谴责收账员和钱庄主们窖藏加拉拉银元(本洋)和拒收鹰洋的不正当行为,并指定一些地点按市价收兑鹰洋。^⑤《北华捷报》曾详细披露此情形: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上海道台要求各银行拟定鹰洋在本地流通的计划,为此成立了三家钱店,要求他们接收鹰洋,并按其与纹银的相对价值兑换铜钱。商民也乐于接受新式货币,因为它的价值得到了官方保证。同时又安排各布店兑换鹰洋,当农民持棉布到布店出售时,农民也就不可避免地收下银元。当鹰洋完全流通后,满足了本地区对它的需要。^⑥

清末,无论是饷银还是赋税,均可搭解银元。宣统二年,江西地丁漕粮改征银元,计每地丁1两折收银元2元3角5分3厘,每漕米1石折收银元2元8角5分,漕粮脚耗加价屯粮余租之属,按钱价1800文折合银元。“照此定律,实征实解,并匀公费,共计地丁每岁收银一百九十二万七千余两,漕米九十万零七千余两。按本案所规定核算,约计地丁可收银元三百四十六万四千余元,漕米可收银元一百七十一万余元,合计可赢余银元九十余万元。”^⑦

至民国初年,财政部和上海钱业公会等亦积极推动新式银元的使用。盐课为清季民初重要的财税来源,民国二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命令,要求盐课统一征收银元,“盐务收款各处不同,或收银两,或收钱文,错杂参差,莫可究诘,非特核算为难,抑且易滋弊窦,现在整顿伊始,应将各项盐务收款,无论向用银两或系钱文,一律按照各处市价折合银圆收缴,以树划一之基础。其商民卖买盐斤,亦须按照市价折用银圆,此后无论官局商民并遵照。”^⑧而后,长芦盐场发布了折收银元的八条章程,规定以后盐税一律按照市价征收银元。^⑨民国八年6月11日,上海钱业公会发布通告,要求各业接受、使用各种新式银元,“自今日为始,无论鹰洋、龙洋及各新币,一律并用,无分轩轻。”^⑩7月5日,又规定市场上流通的银元种类:新币、大清银元、江南龙洋、湖北龙洋、广东龙洋、鹰洋。以上6种银元一律通用。^⑪

除了清政府、民国政府外,英、日、美等国也陆续推动本国银元在中国流通。同治五年(1866),英国在香港设立铸币厂,认为香港银元有着标准的成色和重量,将成为事实上完美和可靠的货币,很快被市场接受,并将取代本洋和鹰洋。^⑫与此同时,英国领事官通过粤海关监督照会督办潮州关税务

① 同治《福建通志》卷87《海防·海禁》。

② 百瀬弘「清朝の異民族統治に於ける財政經濟政策」『東亜研究所報』第21號,1943年,47頁。

③ 《福建省例》卷6《稅課例·行用番銀稅契章程》,台北:大通書局1984年版,第234頁。

④ 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22—1911)》第1册,第42页。

⑤ 《领事罗伯逊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⑥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50—1867), Nov. 29, 1856, p. 79.

⑦ 《贛省改征丁漕銀元之變相》,《國風報》第32期(1910年)。

⑧ 《財政部鹽款折收銀圓訓令》,《長蘆鹽務公報》第1期(1913年)。

⑨ 《長蘆折收銀圓暫行章程》,《長蘆鹽務公報》第1期(1913年)。

⑩ 《上海銀錢公會通告取消鷹洋行市》,《申報》1919年6月13日,第5版。

⑪ 《上海銀行公會通告六種洋元一律通用》,《申報》1919年7月5日,第1版。

⑫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 (1867—1869), Apr. 24, 1868, p. 184.

司,要求以香港新银 110 两 1 钱 1 分抵海关纹银 100 两,不准伪造。^①同时英国也利用舆论造势,声称“大量的墨西哥银元涌入中国将会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然而一个明显和不争的事实,如果确立以白银为国家货币,既不利于贸易,同时会使北京政府丢尽颜面”。^②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打击鹰洋,促使中国当局接受香港银元。

日本也于同治十年铸造银元,“此币经创行数年后在中国各主要商埠,以及朝鲜、安南、暹罗等处流通,亦与墨币有分庭抗礼之概。”^③另一方面,当日本和中国作战的时候,大部分的日本银元从日本运出,用于支付军费,并在满洲、远东与山东的战场上使用。这样运出的银元不会在海关报册上登记,并已转到中国人的手中,以后还在中国流通。^④而日本政府也要求,日本商人不能接受鹰洋,“日本龙洋运入后,按含银量与鹰洋汇兑。不过兑换时出现了一些情况,银库每天从与政府签有和约的欧洲人手上仅能收到 30 元银元,而中国人和其他人则什么也没得到,日本商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鹰洋。”^⑤

同治十二年,美国正式铸造贸易银元,以与鹰洋在远东市场上逐利。“贸易银元投入使用是为了同东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清算。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替代墨西哥银元。墨西哥银元含有 377.25 格令纯银,和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人通常从美国银行以溢价买入,将其用于对远东的汇款支付。”^⑥美国政府试图用贸易银元同墨西哥银元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它最初设想运至中国的贸易银元费用,由墨西哥政府征收白银出口税 8% 所提供的余额偿付。^⑦

此外,19 世纪末国际银价下跌,大量的白银涌入,为中国确立银元的国币制度和银本位制提供了条件。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等欧美国家先后放弃金复本位或银本位,改定金本位,因此对白银的需求剧减,其价格也大幅下降。自同治十年到民国二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高达 2.41 亿两。^⑧

(三) 舆论的呼吁

早在嘉庆年间,学者丁履恒即建议政府铸造银元,他认为此举既可收回货币铸造权,又可抵制外国银元。^⑨道光年间,江苏巡抚林则徐也奏请铸造银币,但未得到皇帝允准。^⑩此后,周腾虎、郑观应等人也发表文章,认为应尽早铸造银元。光绪二十年,广东、湖北等省均已设厂铸造银元,《字林西报》上有文章评论中国各省铸造银元的情形,建议由国家统一铸造银元以兴利除弊,“中国国家不设一大银元局,鼓铸银元通行各省,而于各省零星分设,使其权不归一,隐隐有相竞之意,举措紊乱,未有甚于此事者也。”广东、湖北、吉林等省所铸银元各有差异,难以划一,因此北京政府应约束各省,统一铸造通行之银元,从而达到兴银元之利而除宝银之弊的目的。^⑪

虽然多省已开铸银元,但使用银锭也很普遍。民国六年,上海商董苏本炎致总商会公函云,市场交易向用银两,而平时所用全为银元,商界久受其累,上年厦门已改用银元,奉天亦已改大洋为本位,

① Hai Guan Zong Shui Wu Si Shu, Reports of the Haikwan Banking System and Local Currency at the Treaty Port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9, p. 213.

②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Apr. 22, 1876, p. 389.

③ 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中译本),第 145 页。

④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Sep. 12, 1898, p. 26.

⑤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50-1867), Aug. 27, 1879, p. 15.

⑥ J. Laurence Laughlin, *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ppleton, 1901, pp. 102-105.

⑦ China Mail, May 31, 1872.

⑧ C. F.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6, p. 215.

⑨ [清]丁履恒:《钱币议》,[清]葛士潜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58《户政三十·钱币》,复旦大学古籍藏书上,索取号 556061。

⑩ 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22—1911)》第 1 册,第 17—18 页。

⑪ 《英文报译:论中国银圆局》,《时务报》第 44 期(1897 年)。

因此上海一埠尚无可更改之理,“自海禁开通,洋元流入,人民使用,咸乐其便,以致西班牙、墨西哥、日本等国之银元,充斥全国,前清政府知银元之利用,通飭鼓铸,以广流通。民国成立以来,凡国家预算及完粮纳税,皆改用银元。”“华人对外人交易,定价以金计,买金以银计,卖货以元计,金与银价有起落,而元价又时有上下。丝业、花业,凡丝花新货登场之际,元价必起,此又明受其亏。”上海商界遂拟请自1918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律改用银元。^①

民国八年,有学者呼吁革除银两制度,励行银元,其称我国现时除少数地区外,实际上市面已多用银元,但计算之单位,仍沿用银两制度,并未改革,结果造成计算复杂,奸商正好趁此渔利。在商业方面,也有少数商人利用银两、银元之间的换算,上下其手以渔利。在国家征税方面,一般奸胥猾吏,则利用此换算明抬暗压剥削平民。因此为谋计算简易、革除奸人渔利机会、减少各地商业之阻碍,应革除银两制度,而励行银元制度,以使全国有划一之标准。^②次年,上海的普通交易原用中国银元和墨西哥银元结算,现在却使用越来越稀少,而用银元取代银两作为标准货币的决议已被提出。^③

(四)传统银锭及制钱的局限性

为何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商埠偏好使用银元?其原因除了银元便于检验、计枚核值外,还在于银锭检验工序复杂且费用过高,各地银两种类繁多,互不通用。由于各地银两成色、重量不同,全国没有统一标准,因此银锭在进入市场前,需先经过公估局(由各地钱庄及商会委派)的估定。公估局的批字,标注了银锭流入市场时的重量、成色。估定的具体步骤如下:银锭初出银炉,即先由公估局派员察验,权其重量,用笔墨批明于锭面,次由精于鉴别之专家验定成色,亦用笔墨批明。^④根据公估局的鉴定结果,市面就可以确定银锭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公估局只估定1两以上的银锭,而没有估定1两以下的碎银和散银。因此,散碎银两的重量、成色往往难以得到保证,需要秤量,在此过程中,民众深受暗亏。虽然银锭上标有重量,但一些不法商民人为切割,造成实际的重量比标注的重量更轻。此外使用过程中的磨损,也造成银锭形状发生较大变化,这些都影响到银锭在市场上的使用和信誉。

而当时的银两又有虚、实之分,宝银以及各地使用的银锭、碎银均为实银两,如上海九八规元、汉口洋例银等皆属于虚银两,其作用只用于计值的单位,并不具备支付手段的功能。流通中充当支付手段的银两均为银锭和碎银,但其并非由政府统一铸造,而是由各地熔铸后投入市场,在不同的地区难以通用。各地银两之重量、成色,多由当地之商会、公会或其他类似之机关自行订定。明清时期的中国,大宗营业及缴纳税款时,多以银两计值,实际所使用之银两,大都为约重50两之宝银。宝银由民间设立之炉房铸造,表面镌有铸者之店号、所在地及铸时银炉号码,以便稽查。各地的宝银,有一定差异,北京及四川等处,多见10两银块。而上海、汉口、天津等地宝银,大都重50两。^⑤各地难以通用这一现实,给商业贸易造成了诸多困难,交易首先要兑换当地银两,但又缺乏兑换标准,由此造成额外的麻烦。

近代中国各地银两的平码名称多达百余种,以当时的主要城市为例,亦有几十种,详见表2,可以看出,32个城市均有各自的平码,即使同一省份,亦有差别。而在使用时,缴纳赋税的库平银与民间使用的低潮银也有本质差别。各地主要以改铸成库平两的高成色银单位纳税,而在民间使用时,却多以低潮银流通。

① 《贸易一律用银元之请议》,《银行周报》1917年第14期。

② 《革除银两单位励行银元单位之可缓》,《银行周报》第46期(1919年)。

③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919-1921), Jan. 31, 1920, p. 410.

④ 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中译本),第70页。

⑤ 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中译本),第69页。

表 2 各地银两的平码名称

地名	平码名称	地名	平码名称	地名	平码名称	地名	平码名称
上海	九八规元	南京	二七陵平	镇江	镇二七平	扬州	扬二七平
杭州	司库平	赣州	九七二平	北京	京公码平	天津	行平
保定	保市平	张家口	口钱平	济南	济平	济宁	宁平
太原	库平	大同	同平	沈阳	藩平	安东	镇平
营口	营平	长春	宽平	汉口	洋例	沙市	沙平
宜昌	宜平	开封	二六汴平	洛阳	洛平	许州	许平
信阳	漕平	西安	陕议平	三原	泾布平	重庆	九七平
香港	九九八平	汕头	九九三五直平	福州	台新议平	贵阳	公估平

资料来源: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中译本),第78—80页。

甚至在同一省份,也有各种名目的平色差异,如湖南省除库平和关平两类官平外,其市面尚有长平、市平、湘平、醴平、益平等27种名目。而同一名目之下,轻重又因县而异,实际上不止27种。此外作为官平的库平也不一致,藩库收入为四二平,合长沙省平104.2两,粮库收入为四两平,合长沙省平104两。支出之平又有四二平、四两平、三九平、三六平等诸色名目。^①由于各埠银两平、色不一,结算时须进行繁复的换算,兑换成本高昂,因此埠际之间的大宗贸易,虽以银两计算,实际支付则用银元。而对外贸易以及国内往来,无一不以银两计算其价格,即各地外国汇兑之行市,亦均以当地银两为标准通货,不过仅存其名,并无其实。实际交易,则按当地洋厘折合银元计算。^②因此,秤量繁琐的银锭实不适应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于标准货币的需求。

制钱在中国沿用已久,在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时期,尚能满足商业贸易结算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币值过小的制钱已不能满足贸易结算的需要。而铸钱技术低下和货币法规难以执行,制钱的流通受到“钱重则滋销毁,钱轻则多私铸”的经济法则所支配,私铸和私销的问题一致无法得到解决。^③

此外,制钱因以贱金属(铜)作为币材,币值存在天然缺陷,易加剧银钱比价的波动。另一方面,中国缺乏铜料,清前期铜料的供应大量自日本进口。18世纪初期,日本国内用铜不足,限制铜料出口,造成中国制钱铸本锐减,供应严重不足。^④19世纪中后期,由于铜料缺乏等原因,各地市场上均出现“银贱钱贵”,甚至是“银贱钱荒”的现象。如1892年的天津,制钱在市面几近绝迹。^⑤汉口因制钱短缺,伪铸的小钱反而成为日常使用的主要通货。^⑥宁波的市面因制钱稀缺,出现了“凡值十不能当五”的情形。^⑦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咸丰时曾铸造当十、当百甚至当千的大钱。但是随着币值的下跌,钱的分量变动异常,大小错出,轻重倒置,当五十的大于当百,当百的重于当千。^⑧在此情形下,仿铸制钱的情况层出不穷。同时,尽管政府规定制钱的单位为文,但实际使用时并非按照其单位计值,而是以重量计算,使用者往往会在制钱中掺入锡、铅等金属,增加制钱重量。这也说明制钱虽为清代的法定货币,其信用却日益式微。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银元在与银锭、制钱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四、银元胜出的理论依据

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银元不是计枚核值,而是按照检验银锭的办法,加戳印、验成色,但这一检

① 湖南清理财政局编印:《湖南财政说明书》,1911年印行,第12页。

② 裴锡恒:《中国改行金本位制之先决问题》,《钱业月报》第12卷第2期(1932年)。

③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第11页。

④ 陈昭南:《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台北:商务出版社1966年版,第42—43、65页。

⑤ Hai Guan Zong Shui Wu Si Shu,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2,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8, p. 22.

⑥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May 1, 1899, p. 765.

⑦ 《宁郡市面》,《申报》1896年12月10日,第3版。

⑧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61页。

验过程易造成银元形制变化,这种状况在清中期得到改变,计枚核值逐渐通行。^①与随时可能遭到切割、破坏的银锭相比,银元的形制、价值更为完整,按其面额价值使用越来越普遍。道光十三年四月,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奏称:“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②其中,洋钱即指银元,“无须弹兑”则指免于秤量、检验成色,因而具有一定的价格升水,深受市场欢迎。为此,道光帝发布上谕称:“洋钱平价,民间折耗滋多,惟当设法以截其流。洋钱行用内地,既非始自近年,势难骤禁,要于听从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价值以纹银为准,不得浮于纹银,庶不致愈行愈广,至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大变成法,不成事体,且银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耶。”^③道光帝要求地方当局设法应对洋银升水,但反对仿铸洋银。殊不知洋银与银锭、制钱汇兑产生的升水,是市场选择所致,并非一道行政命令就能改变。道光十五年六月,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奏称:“臣等伏查洋银一项,来自夷船,内地因其计枚定价,既不必较银色之高低,又无需称分量之轻重,远行服贾,便于携带,是以东南沿海各省市面通行。而粤东为夷人贸易之所,行用尤广,大商小贩无不以洋银交易。”^④道光年间,洋银在江苏、广东等地即计枚核值,而非按秤量计算。

相较之下,中国传统的银锭却需十分繁琐的检验工序,以保证其成色与重量。制钱在使用时,也多采用秤量的形式。而形制统一、计枚核值的银元虽在进入中国的早期采用秤量,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本身单位“元”逐渐为市场所接受。因此相对于秤量繁复、检验复杂的银锭与制钱,银元因节省了一定的检验时间和费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成为银元与银锭汇兑时常有升水,且与银锭、制钱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的重要理论依据。

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理论,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但科斯讨论交易成本,主要是针对企业而言。他提到,“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活动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售这类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但却不能消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费用和签约费用也必须加以考虑。”^⑤企业必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达到盈利的目的。“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导致交易成本的减少。但是减少的并非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易成本,而是组织者与其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易成本。”^⑥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到货币检验过程,同样适用,货币检验所产生的费用会引起货币价格的变动。银锭、制钱的检验费用过高,造成二者的交易成本增高,其竞争力因此下降,价格随之下降。而银元的检验费用相对较低,其交易成本较低,货币竞争力由此增强,价格因之上升。

阿尔钦(Alchian)曾解释货币交易费用降低的机制:货币本身不足以降低交易费用,还需有中间人专门经营一种商品,他们所经营商品的检验成本低于他人,且能保证出售的商品无质量问题。只有配合这些中间人,货币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尤其是检验商品质量的费用。^⑦如果将此理论运用到对银元的检验,中间人即为检验成色、重量的验银师。银元统一的形制,容易引起检验人员的信任,从而使得质检过程相对简略甚至免于检验,如此即可节省人力,降低检验费用,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作为通货

① 王业键称由于太平天国的冲击,造成晚清银元流通呈现几种倾向:一为流通区域从南方扩展至北方。一为银锭、银块等逐渐被银元驱逐。一为流通银元有逐渐统一的倾向。一为作为货币单位的元,和传统的银两互相角逐,越来越占据优势。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第44页。

② 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22—1911)》第1册,第14页。

③ 道光朝上谕档,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六第6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盒号980,册号2。

④ 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22—1911)》第1册,第43页。

⑤ [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西德尼·G.温特编,姚海鑫、荆源源译:《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页。

⑥ 奥利弗·E.威廉姆森、西德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中译本),第85页。

⑦ Armen A. Alchian, “Why Mone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9, 1977, pp. 133 - 140.

的银元具有这样的特点,即获取其货币品质的边际成本很低,从而使得其具有理想的价格。

因而根据交易成本理论,降低了交易成本的银元价格相对高昂,相对而言,检验手续繁复的银锭因质检费用较高,交易成本增加,自身的价格优势及货币竞争力相应下降。这就造成银元在东南及长江流域市场上的价格高于本身的价值,从而形成了价格升水。

另一方面,按照现代金融学的经典释义,货币主要具有3种基本职能:(1)商品交换的媒介(支付手段);(2)价值的衡量工具(计价单位);(3)价值的储存手段。能同时满足以上3种职能的货币可称为“完全货币”(full-bodied Money),而缺少某种职能的称为“不完全货币”(Partial Money)。^①而“完全货币”与“不完全货币”的差异在于是否能履行“计价单位”。货币本身并不是天然具备“计价单位”,但“计价单位”可视对货币的描述。^②藉此理论来观察银两与银元的差异可发现,“两”并不能成为计价单位,因其指的是重量,按秤量计算。而“元”因计枚核值,1个银元称为1元,其本身的单位又可执行价值尺度。因此相比较而言,银元更符合货币的3种基本职能。事实上,虽然银两在中国使用的历史十分久远,但其一直未能完全从原来的计重货币,抽象蜕化成“货币中的货币”。银两虽然经历过虚银两这种记账单位的抽取过程,但从整体上看,由于各地虚银两的地域差异,始终未能完成从重量单位向货币单位的转变。^③换言之,“两”并不能成为天然的价值尺度,而“元”能执行货币的计价单位,成为“货币中的货币”。^④所以从货币本身的属性来看,银元也更胜一筹。

五、结语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明中后期实施的“赋役征银”,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持续了几个世纪。因中国自身产银有限,所需白银大量来自美洲、日本等地。起初运入的白银以银条为主,进入中国各地的银炉、银楼加工成银锭后投放市场。在使用前,均进行反复检验成色、重量,质检费用不菲。大约在明万历年间,形制统一的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中国。起初洋银主要在粤、闽等东南沿海商埠流通,五口通商以后逐渐流入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内陆地区。银元最初进入中国,并非按其单位“元”进行计算,而是采用银锭的方式秤量核算。由于其形制统一、价值稳定,渐受市场欢迎,逐步计枚核值(即以“元”为单位);其在同银锭、制钱汇兑时,由此前的贴水转变为具备一定的升水,市场信用也逐日提高。

因明清时期的中国对白银有巨大需求,故而政府对外来白银几不加干涉。银元进入后,由于其含银量低于纹银,清初部分官员建议禁止使用,但由于沿江督抚的反对而未得以实现。鸦片战争后,英国等惟恐清政府禁止外商运入洋银,于是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要求:“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以上各物进出口,通商各口皆准免税。除金银、外国银钱、行李毋庸议外,其余该船装载无论浅满,虽无别货,亦应完纳船钞。”^⑤此后,英商等运入金银及各等银钱,因有了条约保障,更加有恃无恐,洋银进入的数量也在此前基础上有了巨大的增长。因在上海等地市场上有较高的升水,除了结算货币的职能外,银元也可视为套利资本。

银元本身与白银具有物理关系,银元之所以节约检验成本,是因为其成色和重量得到认可,银元提供的交易服务高度依赖于本身品质的可靠。因此本洋、鹰洋先后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两种银元,而香港银元、日本银元、美国贸易银元虽有流通,影响力和流通范围与上述两种银元却不能同日而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通商口岸,银元逐步在与银锭和制钱的竞争中形成优势,最终引发

① 公一兵:《试论清代福建的白银货币结构》,刘秋根、马德斌主编:《中国工商业、金融史的传统与变迁:十至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② [英]凯恩斯著,何瑞英译:《货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页。

③ 戴建兵:《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1935)》,《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④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⑤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7—429页。

清末各省广铸银元的浪潮。而外国银元和中国自铸银元的长期流通,对清季民初以银元为国币的币制改革,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颁布《币制条例》,规定“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①民国三年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七钱二分银元为国币,同时开始大量铸造袁世凯银元。袁像银元由于外形精美,质量上乘,加之鹰洋停铸,日渐成为流通中的主币。但其仍未能取代银锭,梁启超对此认为:“此事从表面上看来,总说商民习惯一时不易改革,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海关不愿取消……关税是财政上的大宗收入……它既不愿废两改元,困难于是就多了。关税的存放,本在汇丰、汇理、德华、正金、道胜五行,五银行困恐改元后不能以银两操纵金融,所以连接海关及外交界的要人来反抗我们的政策。”^②

然而,银元、银锭混用的局面对社会经济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如缺乏统一的货币进行结算、汇兑费用高昂等,这迫使国民政府在1933年宣布实施“废两改元”,真正实现了银元对传统银锭的“货币取代”。^③不过也应看到,虽然银元相较银锭检验更为方便,但金属货币的使用实际早已落后于世界各国,信用货币早已成为英、美等国的主要通货。因而1935年的法币改革,既是应对白银危机的方案,也是向世界货币体系靠拢的举措。

Good Money Wins: The Establishment of Main Currency Status of Silver Dollars in Modern China Market

Xiong Changkun

Abstract: From the 16th century, a large quantity of machine-made standardized silver dollars made in America, Japan and other places flowed into China. At the first stage, using silver dollars was not only based on weighing calculation, but also discounted when exchanging with sycee and copper.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competition with sycee and coppers, silver dollars' advantage was increasingly obvious, whose circulation scale and space expanded, thus becoming the main currency in treaty ports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and the low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Besides that, the market's preference for silver dollars made the Yangli 洋厘 stay at a high level in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o on. From 1890, different provinces cast their own silver dollars based on the shape and quality of Mexican silver dollar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 currency in the market. The monetary reform used silver dollar as the national currency, establishing the “yuan-jiao-fen” currency system while the measure of “abolishing and sycee and using silver dollar” made the silver dollars replace sycee. The theoretical reason why silver dollars won was due to its unified shape and stable value which lowered transaction cos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weighing currency. In addi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lso promoted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dollars. The silver dollar was the important transition from weighing currency to credit currency; and the note issue which used silver dollars as reserve funds also had a direct effect on monetary reform in 1935.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ilver; Dollar; Main Currency; Monetary System

(责任编辑:王小嘉)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宣统朝上谕档》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06页。

② 梁启超:《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饮冰室合集》卷43,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③ 最早提出“货币取代”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 V. Karuppan Chetty, 参见 V. Karuppan Chetty, “On Measuring the Nearness of Near-Money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3, 1969, pp. 270 - 281.